

文化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发展理论与实践



刘钦荣 靳海涛 刘安军 著



新华出版社

正月十五元宵节快乐
吉时又至，乐

春韵食膳
睡在豆房的香洲
竹林深处白雾
迷蒙随身带
绿影暖身地老庄儒释老子
老去月移水莲一枝暖送烟
愁随雪雨飘香
有章五经诗时

郑州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文化发展理论与实践

刘钦荣 靳海涛 刘安军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发展理论与实践 / 刘钦荣, 靳海涛, 刘安军著.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66-1522-5

I. ①文… II. ①刘… ②靳… ③刘… III. 文化发
展—研究—郑州市 IV. ①G127. 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9181 号

文化发展理论与实践

作 者: 刘钦荣 靳海涛 刘安军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 编辑: 王晓娜 封面设计: 天 一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印 刷: 郑州宏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9.5 字 数: 31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522-5

定 价: 5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10—61201322

FOREWORD

前 言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和功用,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文化发展方面的规划纲要,成立机构、组织队伍开展对文化资源多方位、立体式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本书就是在当前文化研究异常火热的背景下,对文化发展尤其是郑州文化资源的开发整理进行的一些探索与总结。

本书对文化发展有关理论问题仅做简要阐述,而把重点放在专题和个案研究上。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灿烂辉煌的郑州文化作为资源、资本如何开发利用?郑州市容文化、广告文化、影视文化发展的现状如何?怎样规划和引导?语言文明建设的内容有哪些?如何进行建设?新词新语折射出社会哪些文化因素?诸如此类,都成为本书论及的课题。因此,本书撰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政府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发展与繁荣提供及时可行的决策服务,价值在于对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可能性等方面做出的分析。

书中部分内容,虽已经以课题结项成果或论文的形式先行公布、刊发,也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指导、纠正,但由于文化发展与建设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许多重要问题仍在研讨探索之中,讨

论、争议甚为激烈，成熟的经验和模式较为有限，而地域文化资源又可谓极其丰富，姿态万象，各具特色，因此文化发展与建设的问题就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社会发展的焦点、重点之一，前景自然无限广阔。本书把我们近些年来对此问题的有关思考结集出版，旨在向诸位专家学者、各位读者再次求教，使我们得以成长与提高。

面对文化这份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我们所知甚少。本书虽然努力寻求个中问题的奥秘，但我们知道它是浅薄的，它的一些认识可能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人类的好奇本性却让我们无法停止脚步。

CONTENTS

目录

总 论	(1)
第一节 文化概说	(1)
一、文化概念的提出	(1)
二、文化的内涵及其分类	(3)
三、中国传统文化	(4)
四、传统文化的意义	(6)
五、城市文化	(8)
六、文化遗产	(9)
第二节 文化产业及分类	(12)
第三节 文化事业和文化服务	(25)
第一编 文化发展理论探讨	(28)
第一节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8)
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28)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0)
第二节 作为资本的中原文化	(31)
一、文化资本的提出与设想	(31)
二、文化资源的确定与研究方法的探讨	(36)
三、本土文化——形成资本的能指平台	(38)
四、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	(40)
五、叙事考古学——一种考察文化资本品质的方法	(44)
六、中原考古资源案例分析	(45)
七、中原文人叙事资源案例分析	(58)
第二编 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整理	(68)
第一节 古代文化资源	(68)
一、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	(68)

二、由“复关”释义看春秋庶人婚俗	(93)
三、中国古代的姓名范字	(101)
第二节 当代文化资源	(105)
一、郑州地名的语言与文化	(105)
二、郑州楼盘名称的语言与文化	(135)
三、郑州街道招牌用字	(175)
四、郑州人名用字中的生僻字	(181)
第三编 文化发展专题研究	(190)
第一节 广告文化	(190)
一、广告中成语活用现象	(190)
二、广告语创作中的误区及对策	(194)
三、商品品名用字	(202)
四、商品命名的陌生化方法	(205)
五、广告语言对语言文字规范的消极影响	(210)
第二节 影视文化	(215)
一、郑州城市本土文化类电视节目构想	(215)
二、“民生新闻”热	(220)
三、城市电视台本土化竞争策略	(223)
四、电视新闻解说词功能定位	(227)
第三节 语言文明建设	(230)
一、语言文明的内涵及其特征	(231)
二、语言文明的构成	(234)
三、语言文明的现代价值	(241)
四、语言文明建设	(243)
第四节 新词新语新时尚——以“PK”为例	(253)
第五节 “写郑州、唱郑州、咏商都”系列活动研究	(262)
一、“写郑州、唱郑州、咏商都”系列活动概况	(262)
二、“写郑州、唱郑州、咏商都”系列活动特色	(264)
三、“写郑州、唱郑州、咏商都”系列活动启示	(268)
附录 1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275)
附录 2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83)



总 论

第一节 文化概说

关于文化的概念争论颇多。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物质、制度、精神;有四层次说,即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

一、文化概念的提出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故园艺学在英语为 Horticulture),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 1871 年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此后,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克莱德·克拉克洪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搜集了 100 多个文化的定义。

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用什么来区分同在一个地球的人们?用血缘,用皮肤,用人种,还是用地理?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区分清楚。到底什么是我成为某某国家的人的原因?文化具有独特性,有句话叫作“互相尊重”、“互相包容”,这便是人们了解文化具有的独特性采取的一种比较科学的态度。文化小至人们心中,大到国与国之间,无处不在。



据专家考证，“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语。“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所载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化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意思是，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亡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



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现在“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但基本形成了以下共识：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的“植立之兽”（《思问录·外篇》）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生物属性等自然性。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举例言之：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上，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中。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二、文化的内涵及其分类

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





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在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一般来说,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多持此类文化界说。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在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畴。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里的“文化”,也属狭义文化。《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这里的“文化”当属狭义文化。一般而言,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属狭义文化。

现代人们在某一地区或某一事物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是就“狭义文化”而言的。除了上述所说的含义外,当代中国社会在使用“文化”概念时一般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性“历史性、群体性、影响性”,如华夏文化、吴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

三、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中

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许思园认为,“中国传统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现。(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



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论》,《求索》1987年第4期)

庞朴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认为: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考古学上则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有时文化也指文明。虽然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已经形成了第一次分工,产生了农业民族和畜牧民族,但早期文化都是在农业民族中产生的,因为畜牧民族要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不容易产生大规模的聚居,对文字没有迫切的需要;而农业民族容易形成大部落,兴修水利需要大量协同工作的人群,所以最早的大国家和奴隶制都产生于农业民族。有了大国家和奴隶制才能产生大批聚集的有闲阶级,他们发明了文字,促使形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类第二次分工。从而产生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指所有人类的活动)。

四、传统文化的意义

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所涉猎的人可能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当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

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了,对我们当前社会还有没有价值,我们通过下列的事实来证明她亘穿古今的强大生命力和日益凸显的社会利益:

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在历史上强



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却早已不复存在。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人民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而当今的人们却将自己锁在一道道铁栏内，社会活动中还会受到频发恶性事件的威胁，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

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近期统计表明，其青少年犯罪率为6900万件/天。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深感不安，有识之士已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崇尚个体、倡导竞争的理念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许多著名大学纷纷开办汉学系，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9·11”事件以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恐怖行动时有所闻，海湾地区战火未熄，多少人生活在不安和恐怖之中。自由竞争发展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升级为斗争，斗争再进展就是战争。不论冷战、热战，结果都是怨恨越积越深，报复一次比一次惨烈。消除冲突，促进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冲突双方需要的不是报复，而是宽恕、忍让和反省。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反之，且看巴以冲突逐步升级的恶果——越来越多的人民在爆炸中无辜丧生、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经济环境遭受重创……再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有识之士无不在努力寻求救世的良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世界需要中国古老文化理念的推广和实践；已被废黜近百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急需拯救。作为中国人，我们更不能“手捧着金饭碗，在外流浪找饭吃”。

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复兴必会带来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也就得以平稳实现。

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



教育。在当前文化缺失、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有不少人误认为道德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条条框框。其实,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真正正常、幸福的生活。

道是宇宙整体自然的规则,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纲领。举例来说,我们人的身体,从母亲生下来之后,整个身体器官就按一定的规则在运作,整个身体的运作规则,就是道。道不是谁设计的,自自然然就是道。如吃下的食物自然就能被消化吸收,走路时,各个部位的肌肉自然就能够彼此协调运动。人在世间如能随顺自然的规则就是行道,这是多么科学、多么自在的生活!

行道有得于心,行道有得于身,谓之德,它是局部运作的原理原则。譬如我们眼睛是一个局部,眼能见,见就是眼之德。眼之德能见、耳之德能听、鼻之德能嗅、舌之德能尝,每个器官皆有它的特殊作用与规则,若规则错乱,人就生病了。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也有其道。如果我们了解人道的内容,在人与人相处时,就自然能和谐有序,从而减轻现今人们所承受的来自人际关系紧张、人事冲突频繁的精神压力。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之道,还怎么会遭受生态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威胁?即便是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这种种人类生存之道就在传统文化里。

道不是制度学说,而是自然的关系法则。道德也没有古今、中外的界限。人行道,心有所得则生智慧,身有所得则健康长寿。道法自然,所以道德本身绝不是人为的框架,而是随顺自然的产物。

五、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涵盖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市容市貌、市民素质、社会秩序、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外显,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城市形态和特征,是城市内部与外部公众对城市内在实力、外显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城市建设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继生产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之后迎来的城市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城市品牌化的过程。



城市文化构建中要注意以下要素,第一,突出个性。调查研究城市优势特征,找到与其他城市形象不同的优势特征。第二,定位准确。形象系统构建避免雷同,突出城市个性,有效强化认知,提升城市品牌知名度。第三,市场导向。城市品牌构建要能够体现城市战略发展方向和城市建设目标,从而引导内部公众与外部目标公众关注、感知本城市形象个性与优势,在心目中形成良好心理预期,并对个体行为起到规范引导作用,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第四,公众认同。城市品牌形象构建要充分反映城市内部公众与外部目标公众心理需求与价值取向,使公众在感知城市各方面要素和传播信息的接触中,逐渐形成对城市品牌形象的认知与支持。这里面包括:长期形成的城市观念、行为和表达方式,城市品牌的构建即是要在追求发展推动力最大化的同时,从观念、行为和表现方式上寻求和公众的共鸣。第五,现实可行。城市形象定位要从实际出发,符合贴近城市现实,确立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六、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在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处理文化遗产问题如果出了偏差,将对文化遗产和社会发展都造成深刻伤害。因此我们有必要明确和端正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保证其本身文化内涵的留存和基本社会功能的发挥。

(一)对文化遗产去留问题的定位

文化遗产的无比丰富性注定人们只能保留和保护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过重的历史负担也可能成为面向未来的包袱。因此对文化遗产的去与留的甄别就尤为关键了。而甄别的要点,应是站在民族文化发展需要的高度进行认识。只要是对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有利的,就不要轻易进行否定和破坏。即使是一些非正面形象的遗产,也可以作为珍贵的反面教材。

文化遗产精华或糟粕的定位如果出了偏差,就可能带来惨痛的教训。



1966 年开始的“破四旧”，就把文物古迹、古籍字画都当作历史糟粕进行消灭，结果成为民族文化的空前劫难。如颐和园万寿山上 1900 年八国联军没有彻底破坏掉的佛像，在“破四旧”的红卫兵手里无一幸免；而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古书就有八十吨。

是精华还是糟粕，我们应当更多地依靠科学的法律法规、专家的意见和人民的呼声去分辨，尽量避免依靠小部分人的好恶或简单的行政命令去判断。

（二）对文化遗产自身功用的定位

首先我们应当肯定，文化遗产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发挥其经济功能，也能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比如仅在 2007 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故宫的门票收入就达到 2300 万元（《北京旅游收入 41.67 亿元》，《北京青年报》2007 年 5 月 8 日，A5 版）。充裕的资金收入就保证了故宫的及时维护和正常运转。

文化和经济性本来可以在文化遗产中获得平衡，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很容易出现偏差，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或破坏文化遗产之文化内涵的现象比比皆是。特别在当前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了。2007 年 6 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 2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 6 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做出解释。以商业目的为出发点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就无法保证不会因为经济利益而扭曲、损害文化遗产自身的价值。在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让文化遗产创造经济效益以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不应以损害其文化价值为代价。以科学的态度合理对待文化遗产的功用，也是对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

（三）对文化遗产与现代化建设关系的定位

文化遗产是从过去时代走进今日生活的，因此当下的建设要求和文化遗产的继续存在之间就会经常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自新中国成立初

